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5期 2000/05

編輯室

私營化 加劇貧富懸殊

面對大眾失業和生活困苦，董建華政府不但沒有抒解民困，反而落井下石：私營化是其中重要一步。私營化的含義不僅指出售全部或局部公營部門的資產，還包括把公營和半公營部門（例如社會服務）按照市場競爭原則或削減成本的方式重組。政府已經或打算私營化的公營部門至少包括：

房屋署	包括公屋私有化—出售公屋以便把屋邨管、維修及改善工程費用轉嫁給居民；及房署公司化—工作外判，四千員工將被裁或工資被拉低
水務署	供水變成一門生意，公眾更難監管水質和水費；署內六千員工被裁員
消防署	政府樓宇手提滅火裝備保養工作外判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總值四億六千萬的政府資訊科技工作外判
工商服務業	讓私人機構參與更多文康體節目的售票、推廣及訂場工作
海事處	將轄下政府船塢的保安及維修工作外判
地下鐵路	3月宣佈私有化，工會調查發現，七成員工反對，擔心引發裁員；管理層還計劃把將軍澳支線的工作外判
社會福利署	長者送飯和家居照顧用價低者得的辦法外判，私人機構（例如快餐集團）也可投標，並計劃把社會服務每三年重新競投一次
民政事務署	部份文化服務及場地外判或公司化、三個演藝團體公司化、至少一項場地管理工作外判

香港政府外匯儲備豐厚，公共開支一向比其他「福利國家」低許多，根本沒有合理的理

由推行私營化。說穿了，政府不過是替工商界提供更多發財機會而已。房署私營化方案一敲定，多間私人物業管理公司便覬覦公屋管理這塊肥肉。有人估計，管理一個一萬個單位的屋苑，每月純利可達二十多萬。政府高官游說工會和公眾支持測繪署私營化，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測繪署有商業機會」。

但是，私營化帶給普羅大眾的，卻是裁員和陷於貧困。不僅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首當其衝，私人機構員工也會被迫拉低工資待遇。貧富懸殊將更嚴重。其實，歐美早在十多年前已推行私營化政策，伴隨私營化而來的卻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這點香港政府沒有理由不知道，但是它為什麼依然積極推行私營化呢？就是因為這個政府不是大眾的民主政府。

無論是香港還是海峽兩岸和外國的經驗，都說明私營化是統治者和富豪有意強加給普羅大眾的，絕非什麼「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在大多數富豪眼中，一切東西都是可以買賣賺錢的商品。可是大眾應該有不一樣的看法：公共服務是大眾所必需、是民生所繫。政府應該根據人的需要而不是其付款能力，去提供各項服務。因此，我們反對政府放棄對房屋、醫療、福利、供水等服務的承擔。我們清楚知道目前公營部門存在各種弊病，需要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不在於私營化、裁員減薪、增加勞動強度，而是提高服務質素和引入員工乃至一般市民的民主管理及監督權。

私營企業必然比公營的有效率？

■ 劉宇凡

上至高官巨賈，下至主流經濟學家，無一不答曰：「當然啦！」實際上不是這樣簡單。關鍵是何謂效率？如何量度？

運輸局在去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一份證明地鐵私有化的好處的文件，文件羅列六個國家的鐵路在私有化後多數多賺了錢或扭虧為盈，結論自然是私有化好了。

問題是，怎麼能夠把利潤當成效率的唯一標準？如果要衡量效率，首先應該顧及生產效益這個標準。生產效益才是效率的主要標準，因為它的提高意味實質財富的增加。至於利潤，就大不相同了。利潤提高不一定意味實質財富的增加。利用壟斷地位不斷加價，或者不斷降低服務質素，用損害消費者的方式去增加利潤，就完全與生產效益的提高無關。由於公營事業多為公用性質，具有天然壟斷的特點，所以在私有化後通過上述途徑去謀利是挺容易的。上述報告的六國包括英國，但英國鐵路之所以盈利增加，相當部份正因為降低安全標準，而結果就是造成去年的重大撞車事故。可見單靠利潤來判斷企業表現是多麼不公道。

如果從生產效益看私有化，情況就大不相同。怎樣衡量生產效益？最普通是看勞動生產率，即產出量與投入的勞動量之比。但是單看這點也不夠可靠，所以經濟學家還要考察其他標準，例如全要素生產率，增值率等（勞動生產率只計算投入勞動量，但全要素生產率則計算所投入的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土地等）。一位英國學者考察了十一間私有化的前公營企業，發覺一個有趣現象：在私有化後，企業表現極不均一，往往是這個指標提高了，另一個指標卻下降了；全要素生產率更是升少跌多；只有利潤率一項，上升的比下降的明顯多出一倍以上（見表一）。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發現。這些研究證明所謂私營一定優於公營根本不符合

事實。

可以從另一角度再考察整個問題。如果私營企業必然比公營優，那麼，邏輯的結論當然是：哪裡的私企多於國企，哪裡的經濟增長就較高。但事實不是這樣。法國、奧地利以至台灣，在戰後長時期裡都有非常高的國企比例，但是經濟增長也同樣高。更有學者研究了五十多個發展中國家及九至十五個發達國的數據，發覺公營企業多寡與人均收入增長不僅沒有必然關係，相反二者甚至多少是相互背離。

硬要私企同公營相比，有時像是拿柚子同蘋果相比。私企唯利是圖，不僅可以不負任何社會責任，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犧牲社會利益，例如工廠排出廢水廢氣、污染環境。現有的公營企業固然有許多缺點，但它往往要負起社會責任。房委會的私營化顧問報告指房署的管理成本比私營高出許多。他們忘記了，房署員工所身負的責任，是私營的所無的，例如處理調遷、調解住戶糾紛、轉介個案給社署、又或是執行房屋政策，包括處理雙倍租個案等等。水務署呢，它有責任向遙遠的地方供水，儘管為此每年支出千二萬，但是收到的水費不足二百萬元，是虧本生意。從資本家的錢眼看，虧本生意沒人做。然而，公營事業的宗旨恰恰不是唯利是圖，而是按需供應。這種虧本生意對維持整個社會的凝聚力、進步及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硬要公營事



歐洲鐵路私營化以後，火車意外大增

業同私企在盈利上看齊，根本就是借口搞私有化從而推卸責任。

那些高唱私企生產效益優於國企的人，故意不談另一種效益——分配效益。公營事業私有化之後，利潤提高了，可是，這些利益落到什麼人袋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首先落到企業董事手裡。本來，私人大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們酬金過高，犧牲了廣大小股東利益，早已為人批評。公營企業私有化後，同一現象只有變本加厲。表二告訴大家英國的經驗。第二類受益人是工商界。試想，地鐵私有化，憑其半壟斷地位，當屬優質大藍籌。大批買下這些股票的資本家，等於買下一盤幾乎必賺的生意。另一方面，工人卻首當其衝：私有化幾乎必然帶來裁員（這是提高盈利的不二法門），結果一面是失業員工陷於赤貧，另一面則使在職員工陷於身心俱損（因為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私有化有利誰不是明如白晝嗎？

政府和工商界會這樣反駁：「但至少私有化可帶來競爭，從而惠及消費者呀！」這是事實，但是，是個別情況的事實，而非普遍情況。普遍情況可以有幾種：第一，對於那些具天然壟斷的行業，如水、電業，私有化後根本不可能會帶來多少競爭，所以價格根本不會下跌很多，有時甚至還要上升。第二，對於那些不具或少具壟斷性的行業，如郵政、電訊等，私有化後可能會暫時引起激烈競爭及價格下降，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優勝劣敗的淘汰下，往往只剩下幾間大公司，並照樣實行寡頭壟斷，這時價格就會上升。

還有，我們籠統地使用「消費者」這個詞，很容易上當受騙。消費者有個人消費者與工商業消費者之分，你說的是哪種？英國私有化的經驗證明，公營企業在私有化後的種種減價措施，往往只惠及工商業消費者，因為他們用量大，比較具有議價力。廣大的個人消費者呢，用量小，又分散，只能由私有化企業予取予攜。英國在把電訊私有化後，監管當局承認，在1990至1995年間，個人消費者所付價格，下跌1%，而商業用戶的卻降了20%。此外，在唯利是圖的原則下，私有化企業很自然會優惠中心地區的消費者（因為用量大）而歧視邊遠地區。瑞典和馬來西亞把郵政私有化之後，首都郵費下降了，但其他地區卻上升了。

到現在不少工會領導仍相信所謂私營必優於公營論。上述事實希望能促使大家重新思考。

參考資料：

- Sawyer, M. & O'Connell, K. (1999) *A Future for Public Ownership*,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rtin, S. & Parker, D. (1997)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Routledge.
Hossain, M. & Malbon, J. (eds.) (1998) *Who Benefits from Privatization*, Routledge.
林毅夫，蔡昉及李周(1999)，〈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表一、英國十一間國營企業在國營時期與私有化後各時期的經濟表現的比較

按各種指標計算	上升	下降
勞動生產率增長	19	20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12	28
增值率	23	17
利潤率	28	12
按四大時期計算	上升	下降
私有化前	24	15
私有化後的短時期	20	24
衰退期	17	23
最近期	21	15
總計	82	77

備註：本表來自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P. 215 (見參考資料)。這個表是原書前一個表的簡化。原表仔細羅列十一間公司在四大時期的四個指標的升降，所以平均而言每間公司都有16個數據。明白這點就能明白為何上升與下降的數字遠超過十一間公司之數。

表二、英國國企在私有化後董事薪酬的增長率

	增長率 %	考察年期
聯合英國港口	67	2
英國航天	181	5
英國原油	101	5
英國電訊	136	3
英國石油	36	2
大東電報局	352	3
企業石油	215	2
國民空運財團	93	2
英航	242	2
英國煤氣	68	2

可資比較的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公司董事的平均薪金的增長率僅為7.5%。本表來自 *A Future for public ownership*, P. 10

私有化、世貿與中國工人

■ 王英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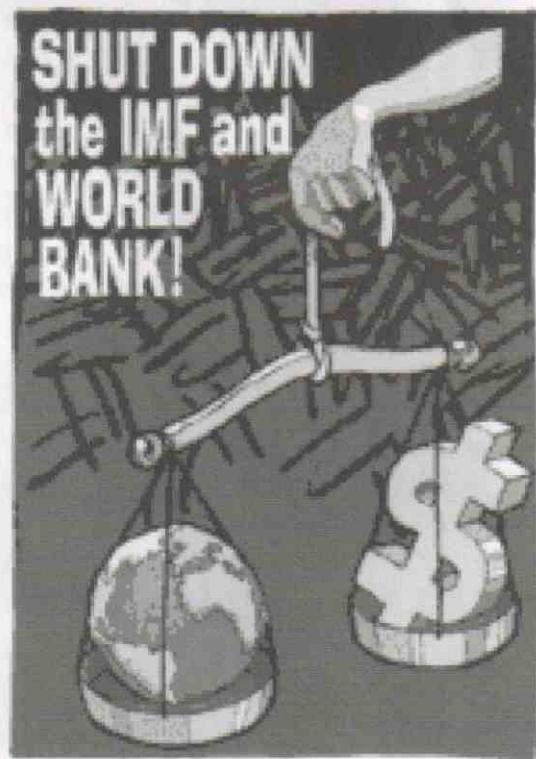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承諾的是建立一個沒有剝削、真正民主、免受外侮的國家，為此，在1946年至1949年中國爆發了人類史上最慘酷的內戰，數以百萬計的工農子弟兵在解放戰爭中死亡。在建國初期，農民忍受著工農產品價格差額的剝削，工人的經濟訴求被壓抑，以強化國家資本的累積。可是在建國後，屬於全民所有的國有經濟只是掌握在獨裁的官僚手上。雖然中共還是對城市居民實施了一系列生活保障措施，但是隨著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開始，這些生活保障便開始崩潰。

雖然現在當權的江澤民宣稱，中國的經濟仍以公有制為主導。可是，那些依著人民血汗累積而來的公有資產不斷流失。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被私有化。隨著中國加入世貿，這種趨勢更為明顯，這對中國工人和農民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私有化的情況與世貿

中共宣稱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實際上只是維持大型國有企業的控制權，在實施股份制的大型國有企業，政府仍維持最大的控股權。對於中小型的國有企業以及地方的集體企業，則放任地方政府透過拍賣、股份制、合資等形式進行私有化。在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往往被賤賣，政府官員或原企業管理層則蒙受其利。不過，由於中央政策使然，大規模的、急速的私有化並未發生。私有化是以逐步蠶食公有資產的方式進行。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情況將起變化。在中國與美國簽訂的加入世貿的協議中，中國將要大幅降低農產品和汽車關稅、開放銀行及保險市場、電訊業外資持股量可達50%等等。有人估計，有關協議將使近千萬農民失去生計。傳統重工業也將失去國家的保護。而為了加入世貿，中國要積極推動私有化，將經濟體制全面改造成市場經濟，為跨國企業進入第三世界搭橋鋪路。中共所聲稱維持公有制為主導的政策將要作出調整。一向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重工業及關乎基本民生的基礎行業也需向外資及國內私人資本開放，以符合所謂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滾蛋！」

經濟自由的尺度。私有化將大規模地進行，屆時，工人的處境將更為不利。

私有化所引發的問題

支持私有化者往往聲稱公有制效率不彰，並刻意跨大國有企業的虧損情況，稱只有私有化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是，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一些基本的事實：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有企業的上繳款項。而且，即使相當部份的國有企業虧損，但國有企業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包括在職員工的住房、社會保險費、員工的退休金等，它沒有像私營企業那樣把這些問題置諸不理或扔給社會去承受……換句話說，如果以社會效益來比較，國有企業不遜於私營企業，甚至更佳。

如果私有化進一步擴大，那就意味著工人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一、失業率進一步提高：在絕大部份的國有企業、乃至集體企業，均較嚴格遵守政府規定的每周工作四十小時的規定。政府在1995年5月1日起實施此規定（企業最遲不得於1997年5月1日起實施），目的在增加職位，可是實效不大。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絕大部份私營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工人工作時間均遠超此規定，在私營工廠，工人每週工作一般長達七、八十小時以上。私營化即意味工人的勞動強度加強、工作時間延長、所引發的即是大量工人被裁減。現時近一億國企工人中，已有二千萬的下崗工人，大規模私營化勢必使人數倍增，而且失業後的生活保障也將成為奢望。

二、失掉職業保障：中國勞動法並沒有為工人提供職業保障，只有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依靠國家殘餘的政策，才有多一點的職業保障。在一些勞動密集及技術度不高的私營企業，往往對工人實施青年期過後即解僱的政策。私營化也就意味大量中年工人的失業。

三、社會保障的萎縮：近年來，中共廣泛宣傳要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可是，參與社會保險只有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絕大部份私營企業並沒有參與，私營化就意味社會保障的萎縮。

四、整體勞動條件的降低：現時，國有企業在一些重要行業仍然佔主導地位，一旦這種形勢改變，僅存的國有企業要與私營企業競爭，只有兩個方向：一是私營企業工人改善勞動條件，使生產成本中的人力部份與國有企業看齊；二是國有企業削減工人的工作待遇與私營企業看齊。在中國沒有民主自主工會及缺乏工人集體力量的情況下，至少在中短期內，前者的發展方向更有可能。

私有化得益的只是國內新進的資產階級及跨國企業，受害的是工人階級。

私有化除了帶來以上對工人的影響外，還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原則問題：社會財富的創造，是全體社會成員勞動的成果，絕不應為少數人所壟斷，更不能任由少數人藉著財富的壟斷，宰制人民的生活。把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化，就是對這個原則的最大背叛，是對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工農子弟、在公有資產累積過程中流血流汗的工人和農民的最大背叛。

結語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反對私有化，並非要回到舊有的專制的計劃經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改革應朝著企業的民主管理及增進社會效益的方向而進行，而不是為資本家剝削工人開拓更廣闊的空間。同樣地，反對世貿，並非反對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而是堅持貿易是為促進人類的福祉及社會進步而服務，不是為資本家及財團的擴張服務。

是「既得利益保衛戰」還是「反私有化運動」？

■ 阮惠晴（台灣）

編者按：在台灣，私營化稱為民營化。過去民進黨一直推動民營化，說民營化就會打破國民黨壟斷，造福人民。本文分析結果相反。本文更進一步分析台灣反民營化運動進展艱難的原因，是工會未能克服公營與私營部門之間的隔膜，以及未能真正做到工運與社運的結合。

場景一：1998年12月3日，一位台灣汽車客運公司的離職失業員工自殺，這已是一年來的第三件。曾經執汽車客運業牛耳的台汽公司，一方面背負著公營事業多半具有的政策包袱（如為了外交被迫購買價高質劣的車輛），一方面在國民黨放手讓地方派系經營的民營客運業壯大的競爭壓力下，以及大量進口小客車的政策下，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民營化」成為政府擺脫這個燙手山芋的不二法門，而在民營化之前，已經有大批的員工被遣散，員工人數在短短幾年內從一萬四千多人驟降到三千人。被迫離職的員工平均年齡為四十七歲上下，在經濟不景氣之際，處在「退休太早，再就業太晚」尷尬年齡的員工們很難找到工作。台汽工會調查了四千多名離職員工，離職三年後，仍有六成的人處於失業狀態，另外有二成半的員工雖有工作，但因薪資低、專長不符、或是受到差別待遇等，仍在找尋其他工作機會；只有一成半的比例有穩定而滿意的工作。前途茫茫、找不到工作的愁苦和社會無情的壓力，使得少數台汽員工走上了絕路。

在過去，台灣有著龐大的公營事業，分別屬於中央（如電信、中油、台糖、台電等）、省市

（如臺灣銀行等多家銀行、台汽、鐵路局等）以及縣市政府，林林總總，超過150家以上，涵蓋的產業包括金融保險、海運、媒體、鐵路公路、石化、造船、郵電、醫院、水電燃氣、鹽業、工程營造等。1980年代中期，國民黨政府開始推動民營化，除了將股份賣給私人資本家外，同時以「自由化」政策，將原本由公營事業壟斷的市場（如電信、加油站、電力等）逐步開放私人經營。

面對政府的既定政策，公營事業員工對民營化後的工作權及勞動條件充滿了不確定感，對民營化質疑的聲音漸漸大了起來。隨著民營化的腳步加快，弊端隨之浮現。已經民營化的幾家公營事業淪入黨營事業及財團手中，也有虧損連連、乏人問津的事業在出售後不久，員工即被強制裁員。原本民進黨和自由經濟學者力主民營化，是為了削弱國民黨的經濟基礎，然而民營化的結果卻是原本仍可受國會監督的公營事業成為黨營事業及和國民黨有特殊關係的財團的囊中物。

公營事業工人們面對民營化浪潮，開始提出了一系列的訴求。大多數的工會認為民營化不可能阻擋，重點是員工權益的保障，希望獲得優惠的補償方案並要求資方在民營化前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要求公營事業董事會中擁有一定比例的工會代表（就是所謂的產業民主）。在民營化成為黨營化、財團化的問題廣受大眾知曉後，「暫緩民營化，以重新檢討民營化政策」成為具有一定正當性的訴求。

然而，公營事業工會抗拒民營化的運動具有相當的侷限性。一方面，訴求焦點集中在工作權保衛戰和產業民主的運動，容易被視為既得利益者的反撲，難以取得大眾的支持，也無助於彌縫公營與民營企業工人的差距。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一直在台灣佔絕對的統治地位，包括公營事業工人在內都基本接受了這套想法，認為民營化有助效率，自由化可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所以無從在根本上反對政府的自由化、民營化政策。有的工會在反對民營化時還提出「自由化優於民營化」的說法，無視於民營化不過是自由化路線的一環。所以整個反民營化運動無法在目標上提升，也無法真正擴大結盟的對象，結合民營企業的工人及在民營化過程中的受害民眾，更不用說將台灣反私有化運動的目標朝向反省、批判目前的社會經濟制度邁進。

場景二：1999年底，在總統大選熱火朝天進行的同時，號稱全台灣最強的自主工會—中華電信工會也在進行一場「政權保衛戰」。三年前張緒中領軍的自主工會將國民黨長期掌控的工會主導權拿下，之後工會積極推動反民營化的運動，也在各項議題上爭取員工的權益。自主化後的工會高舉「工會社會化」的大旗，動員會員參與教育改革、司法改造等運動，也投入籌組全國產業總工會的工作中。他們更跨海和各國電信工會進行交流結盟，中華電信工會的活力與實力受到普遍的重視。三年來的政績讓自主工會幹部自豪的打出「勞方執政、品質保證」的口號，信心滿滿的投入工會改選。

在這次改選之前，中華電信公司正進入民營化的關鍵時刻，國民黨大力推動釋股，牽動了國內外大資本的龐大利益，為了拔除民營化的絆腳石，國民黨對「光復」工會勢在必得。但是選舉的結果，是資方支持人選獲勝，這對台灣工運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挫。今年春天，工會地方分會的改選中，勞方的成績仍不盡理想，勞方執政時的工會工作人員以「政黨輪替」來形容敗選。3月18日，陳水扁當選總統，正在籌備中

的全國產業總工會一時間地位水漲船高，資方掌握的電信工會仍繼續參與全產總的運作……

以上所敘述的不過是台灣私有化問題以及工會面對私有化時採取的行動（老實說，我們很難稱這樣的行動是「反私有化運動」）的幾個側面而已，卻可以反映其中的許多問題。

一位長期參與台灣工運，在敗選前是電信工會專職工作人員的朋友，在檢討此次電信工會敗選時如此寫著：

「電信自主工會的『工會社會化』，面對民營工人與其他社運團體、社會消費大眾這兩個團結的對象，似乎仍無法破除『既得利益者』、『民營化 = 企業化』等形象，也無足夠的條件剖析『電信市場開放的初期競爭帶來更便利的服務』等表象；而從其他公營事業勞工的反應，也更凸顯近幾年由國營事業工會所主導的反私有化運動，其個別化與孤立化的格局。」

歸根究底，這場『所有制的戰爭』，若沒看到與民營工人的關係、若沒將國營事業勞工的短期利益過渡、結合到全民、弱勢的利益，國營事業工會所有的「工會社會化」都將只是為「社運大團結」這個美好圖像記上一筆宣傳的功勞。

台灣公營事業私有化的大勢似乎底定，然而，整個社會改造的路仍是相當漫長，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提升反私有化運動的思想內涵，鍛鍊出一批對國家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有著深刻批判能力的骨幹，深化社會大眾對民營化問題的討論，為未來的運動奠下更厚實的基礎。

由世界各地超過 500 個公營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他們除了爭取水務工人應得到合理
營是關乎整體社區的重要事，要令
食水變成商品。

最近 PSI 更針對 3 月中舉行
「2000」，動員所屬的水務工會於
營。「世界食水論壇」是國際機
。另一方面，擁有四十五萬會員
水監察行動」的抗議運動。像很
著重與社區團體及其它民間團體
員會」，進行教育及意識提昇的工
源不受污染。

因為水務私營而引起的民眾抗議
市發生的群眾示威。經過十多年的抗
於也在去年售予私人公司，背後的業。
水務私營化後，惡果很快就出現了。
費，Cochabamba 市的人民舉行連
月 4 日，要求將水務重新變為公營。
最終召喚軍隊鎮壓民眾，至少有 3
過 30 人受傷。

那裡有私營化，那裡就有反抗運動！ ■ 施鵬翔

近年各地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私營化，反對私營化的運動也隨之而起。香港去年的公務員大遊行的參與者有二萬人之多，所顯示的工人集體力量，是香港歷史上罕見的。

這一期「全球化地圖」要為大家介紹世界各地的反私營化運動，我們選擇了一起可供借鏡的例子。我們相信，以下的例子對香港的反私營化運動至少有兩點啟示：

一、國際化：私營化既是各地政府普遍推行的政策，而且獲利的往往是跨國企業，因此我們的反對運動也應該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民眾；二、本土化：私營化不單感脅公務員的飯碗，更影響公共服務的質素，因此反對私營化的運動必須要滲入社區的層次，發動小市民的參與，才能成功。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群大富翁

■ 黃月媚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面鼓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另一面向人民保證：「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廿年下來，事實證明有先富，卻沒有所謂共同富裕可言。大陸的收入差距到今天已經發展到驚人地步。我們先看看堅尼系數。堅尼系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一樣；1 表示絕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集中一人之手；0.3-0.4 表示中等程度的不平等。從表一可見，大陸在「改革」之初的不平等較低，以後則急劇上升。如果拿中國同其他國家比較，會發覺中國的不平等遠超發達國家，甚至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還要厲害。有人以

為中國收入差距大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表二證明經濟發展水平同中國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沒有必然關係。

再看看城鄉差距。幾十年來，中國的急速工業化首先是靠不必要地犧牲農民利益而來的。「改革開放」的頭幾年多少改善了農民生活。可是從 1985 年開始，農民又再受到種種超級剝削，

表一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1995
	0.16	0.19	0.2	0.23	0.37	0.42

國家	中國	美國	丹麥	加拿大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	孟加拉	巴西	印度	印尼	斯里蘭卡	越南	俄羅斯
年份	95	94	92	94	95	92	95	94	94	90	93	93
系數	.42	.40	.25	.32	.35	.28	.60	.30	.34	.30	.36	.31

致辛跑小年的 19 少發結陷展人十大是計大

管？可怒也！

部門工會所組成的國際公共服務工人聯會（ILO）近年致力展開反對食水私營化的運動，的工作條件外，更直接了當地指出食水私人人應該起碼有足夠的乾淨食水，反對將

「世界食水論壇」，發起「世界食水日」（1月22日）舉行抗議行動，齊齊反對食水私及跨國企業討論食水私營化的重要會議。

的加拿大公務員工會亦發起一個名為「食水反私營化的運動一樣，「食水監察行動」合作，例如在社區層面組成「食水監察委員會」，以及聯合環保團體，齊齊保護食水來

抗，最激烈的要算是玻利維亞Cochabamba公營事業私營化，Cochabamba市的水務終身財團則是一間以三藩市為基地的跨國企現：在今年一月，該公司決定大幅增加水的示威和罷工才迫使水費暫時凍結。在的民眾發起全市大罷工及遊行，政府官員個人被射殺（包括一個17歲的少年），超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日漸增加。農民種田一年，賣給國家後所得還不夠他城市打工一月。雖然近兩三年差距縮點，但仍比1985年高。

自然不是凡城市人口就有錢。1990城鎮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低收入戶的平均收入差距為2.9倍，5年已升為3.8倍。

很多人以為致富是純因個人努力，至種見解不適用於中國。在多數情況下，財的人都是因為直接或間接與官商勾化公為私及貪污腐敗有關。

國內學者何清漣寫了一本叫《中國的富翁》的書，總結了中國大富翁的三個發展：八十年代初的第一代富翁是「半鬼」，因為發財者主要是個體戶；八十年代中的第二代富翁則是「凡夫俗子」，只是原有的科技人員；第三代富翁則是「半人半神」，即各級官員。保守的估，在1982-1992年之間，共有八千億

歐洲鐵路工人大團結

歐洲的鐵路工人在去年11月23日聯合一致行動，反對歐盟提議加快火車服務的市場化和私營化。歐盟的邏輯是市場化可以加強效率，但歐洲各國工會組成的「歐洲交通運輸工會聯合會」卻表示：「英國的經驗顯示市場化和私營化會削弱鐵路運輸的安全標準、削減工作，以及使留下來的工人工作壓力增加。

當日，比利時、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臘的工會一起進行罷工行動，奧地利、德國、荷蘭及英國的工會則向政府進行遊說及舉行記者會表達反對意見。工人的集體行動迫使歐洲議會的交通運輸委員會，承諾將來的討論會著重工會的參與。

不要大財團打理的世界都會！

擁有十二萬會員的南非市政工人工會（SAMWU），一直是世界各地工會中反私營化最落力的一個。作為公務員工會，他們堅信公營部門需要改革，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優質及廉價的服務，但私營化卻與這目標背道而馳。在對抗食水私營化的運動上，SAMWU不單聯合南非其它的工會，更與社區團體連成一線，齊齊反對這個對水務工人及廣大民眾都不利的計劃。

最近，SAMWU連同南非其它工會反對約翰尼斯堡市政府提出的Igoli 2002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出賣市政府的公共資產（如機場、運動場、濕貨市場、煤氣公司等），以及將公共服務交給私人公司打理（包括水、電、衛生、污水處理、巴士等服務），來達到減少支出，及將約翰尼斯堡建設成為一級世界都會的目標。

SAMWU及其它工會指市政服務的惡劣並非財政短絀所致，因為市政府擁有大量儲備（與香港何其相似！），而是因為管理不善。而解決的方法絕不是私營化，因為這會令服務變差，而且更多人將因此而不能負擔。在去年10月的萬人遊行中，更有工會領袖責備市政府此舉其實是將公民變成消費者。

人民幣的國有財產落到官員手中。另一方面，卻是大批工人下崗、失業。官方失業數字已經近二千萬，今年還要添一千萬。怪不得工人流傳這樣一句順口溜：「毛澤東叫人下鄉，鄧小平叫人下海，江澤民叫人下崗。」

表三 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之比

1985	1989	1992	1993	1995	1997
1.9	2.2	2.6	2.9	2.7	2.5

水務私營 的害處

口 崑山

公 共服務私營化、走向「用者自付」的原則似乎是大趨勢，但世界潮流不一定對普羅大眾有好處。

特區政府以財政赤字龐大及要提高成本效益為理由，有意把多個部門「公司化」，包括水務、郵務、公屋、測繪等。公司化的具體內容尚未公佈，但從本港其它私營或公司化的公共服務，及其它國家的經驗，我們可看到私營化為基層員工和市民帶來很多不利之處。下面嘗試集中討論水務私營化帶來的問題。

水務私營化 水費飆升

根據水務署工會聯席會提供的資料，去年水務開支是 75 億，政府要補貼 50 億。若私營化，政府大多不會補貼，經營集團更需牟取利潤，加水費在所難免，若經營

集團的認可利潤是 15%，政府不用補貼，估計市民每年要多交 55 億水費（見表一）。平均每名市民每年多交 900 元，是現時水費的 2.2 倍。這估計是否有點誇大？且先看其它國家的先例。根據國際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的報導，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水務私營化後，水費在 5 年內平均上升了 106%，然而在同一個 5 年內，水務公司的平均利潤急升了 692%（註一）。

要有這麼高盈利，當然要開源節流，開源就要增加水費和各項有關服務收費。現時香港有多項供水服務是免費的，包括沖廁用水、首 12 立方米食水等，相信私營化後，市民難以免費享用這些服務。另外，政府有義務為偏遠鄉村的居民（一般都是年老及貧困的村民）供水，但私人公司不一定會這樣做。偏遠鄉村供水計劃每年單是經常性支出便要一千二百萬，遠超過收到的不足二百萬的水費，這樣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投資計劃在水務署私營後，很可能受影響。

剝削基層 高層自肥

要降低經營成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削減員工薪酬和人手。估計水務署公司化後，基層員工工資會下調 30%（現時

表二、公營機構行政總裁薪酬水平

機構	薪酬 (百萬港元)
金管局	800-850
九鐵	650
證監會	600-650
地鐵	600-650
聯交所	596
醫管局	440-490
房屋協會	440-450
強積金局	426
貿易發展局	300

(資料來源:明報 1999 年 5 月 15 日)

某些職級新入職公務員工資已降了三成）。又由於員工工作量增加，「剩餘」人手會遭解僱。

可是，私營化公司的主管，往往可大幅加薪自肥，英國西北水務公司的董事薪酬在五年內便增加了 708%，管理高層往往獲得價值超過一百萬鎊的認股權（註二）。回頭看香港，公營機構行政總裁的薪酬就高得荒唐（見表二）。九廣鐵路公司化後，其行政總裁的年薪就高達 650 萬。市民繳交的各項高收費，養肥了這些總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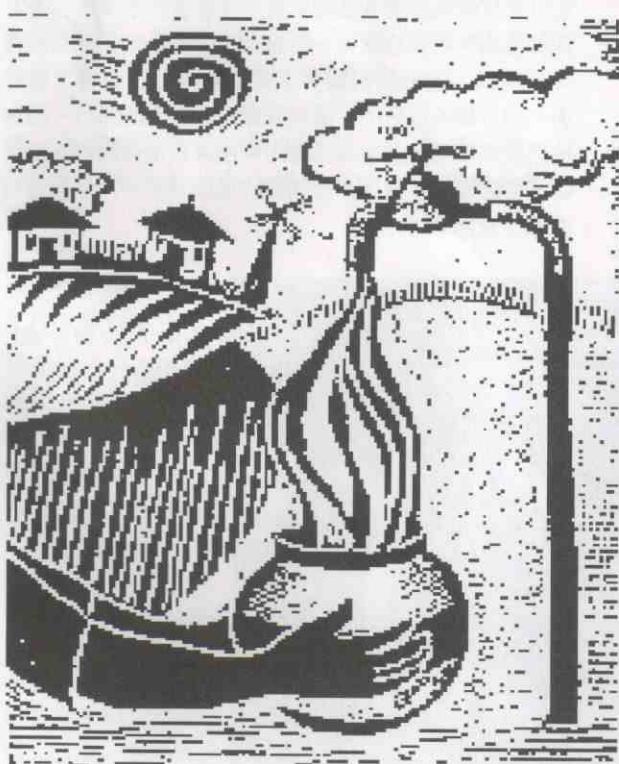
要降低經營成本，另一方法是減少不顯眼的服務，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估計有兩成半食水是因喉管漏水而浪費掉。問題根源在於利潤。對食水公司來說，建造水塘或在河流抽取食水比修理喉管還便宜，所以公司寧願放任漏水也不修理，但建造水塘或在河流抽取食水對環境會造成負面

影響：在河谷造壩及將之淹沒，消滅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從樹葉及昆蟲算起的整個的食物鏈，以至整個當地生態環境，都會大受影響；有生命的地方就會有污染，被抽取食水的河流，由於水流有時減少到其自然流量的近一半而變得惡劣；魚類及其他水生動植物迅速消失，因為其自然環境消失了。

另外，水務私營化後，污水渠的滴漏比率大大上升。滴漏的污水污染了供食用的地下水，從前英國人可直接飲用自來水，現在卻要燒滾才能飲。本港水務私營化後，市民更難監管喉管漏水和更換舊水管等問題。

水是天然資源，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應該是人類共有共管，而不應由財團擁有控制。政府若決定供水私營化，對市民帶來很多不利之處（好處卻說不出有多少），卻為財團帶來商機和豐厚利潤。由於近年內地缺乏具吸引力的基建投資項目，香港的基建和公用公司均覬覦供水業務及其他私營化計劃。外國私營化經驗使我們看到財團「有錢放水，有錢關水」的不人道做法。香港市民以後要以低廉的費用享用水資源，就得致力反對私營化。

註一、二：Shepherd, E. (2000) 「英格蘭及威爾斯水務及運輸私有化經驗」，載於《先驅季刊》，2000 年春季號。



「甚麼都不爭，便坐以待斃」

訪問房屋署工會大聯盟
召集人林民焯先生

□ 訪問：林致良

問：最近天頌苑短樁事件，導致最後需要把大廈全棟拆卸。請問短樁事件與房委會近年推行的私營化、外判化是否有關？

答：絕對有關係的，為了外判化，房委會將不少新工程完全外判。房委會的建築工程自1973年迄今被豁免於建築物條例之外，因此房署內部定下了嚴格的建築工程守則，由一組專業並獨立於商業利益之外的公務員負責執行。可惜，以天頌苑為例，房委會連這個監管角色也外判了給一家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變成商人的營運在毫無政府監管之下進行，疏於監管以致偷工減料的機會相應大增。

問：政府高官說私人管理公司的服務質素必然比房署員工的要好。您們同意嗎？

答：高官將兩者比較，是不恰當的。公屋的管理工作，可以量化的工作歷來都外判給私人承辦商負責，一般是價低者得。因為支出的全是公帑，一直以來都是由房署的公務員監督他們。近年房委會引入私人管理公司負責這類監管，但卻需要房署內的公務員監管這些公司，做成雙重監管的浪費。況且，一切設備、管理處、物料等都由公務員負責提供和支援，那些公司只需派人手便可以，差不多是無本的生意。在此情況下，作出兩者比



林民焯在遊行中演講

較，實在是愚弄大眾。

問：不少勞工覺得私營化、外判化勢在必行，爭都無用。您可否以房屋署工會大聯盟三年來的抗爭經驗談談這個問題？

答：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香港愈來愈行政主導，政策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構思後，幾乎便事在必行，而目前的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接近是「商人主導」，許多政策，尤其是私營化、外判化，只是想擴大商機和商人的利潤，卻深化了對勞工的剝削。那麼難道我們便任由形勢惡化，要默默被加深剝削嗎？我們的經驗是，爭其上，得其中；爭其中，得其下；甚麼都不爭，便坐以待斃。

問：房署私營化已拍板實行，逐步遣散員工。您們工會下一步的爭取目標是甚麼？怎樣團結更多房署員工和其他部門、行業的工人參加反私營化的行列？

答：其實，我們已爭取到員工暫時不會被強迫遣散，這當然是拜大聯盟的先知先覺，在部門「放風」時，已發出警覺，凝聚了房署同事的危機感，發動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抗爭集會，亦聯絡其他部門的工會，獲得了他們廣泛的支援。這是一場持久戰，因為看不見當局會輕易願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反而是一面倒傾向工商界。所以，公務員、資助機構同工以至受僱於工商界的打工子女，是我們急於要團結和推行勞工教育的對象。另外，我要強調，我們要團結一致去抗爭，不是團結一致去投降。所以，我們對出賣勞工權益的某些工會和工會代表，絕不能掉以輕心，要向群眾揭示他們的惡行，因為他們並非為我們的權益而努力，極其量是替我們搞些所謂「善終服務」吧了。當我們的權益受損了，他們便可向僱主邀功以自肥！

房署工會大聯盟介紹

房署工會大聯盟於1997年6月成立，由房屋署28個工會組成，包括署內高、中、低級的工會。目標是團結員工抗衡房委會把公屋維修及管理工作擴大私營化。上年4、5月間二萬公務員多次遊行反對私營化，大聯盟都積極參與。

「唯有集體力量 才可爭得權益」

—訪問起居照顧員及家務助理員協會主席鄭清發先生

□ 訪問：林致良

問：最近社會福利署計劃把家居照顧和送飯服務用價低者得的辦法外判出去。聽說外判後家務助理員的工資大幅下降。具體情況怎樣？

答：現有的家務助理隊一般由 12 人組成（家務助理員 7 人、廚師 2 人、司機 1 人、工友 1 人、主管 1 人），一併提供家居照顧和送飯服務，此之謂「一條龍服務」。社署要將膳食服務和家居照顧分拆投標。上年 11 月第一批競投得家居照顧服務的資助機構，所聘請的家務助理員薪酬由原本的 \$9,700-\$12,000 減至 \$8,000 至 \$5,000 不等；並且將部份家務員用兼職招聘，時薪由 25 元至 30 元不等。另方面膳食服務雖然未揭標，但已有機構聘請時薪制送飯員，時薪由 25 元至 30 元不等。反映資助機構紛紛用削減員工薪酬的辦法投得新服務。

問：社署說現在的送飯服務要 80 多元一餐，比「市價」貴許多，所以要外判服務。這情況該怎樣看？

答：首先，社署誤導市民：家務員的工作不限於送飯，還包括洗衣、健康照顧、餵藥、緊急服務（例如發現長者暈倒立即送院）等。其次，從根本上說，這些服務是人的服務，不應單用市場價值去衡量。現有家務助理服務是一條龍服務，服務對象需要員工提供貼身的個人照顧，雙方因此建立起互信關係。分拆服務後員工聽到不

少服務對象反映，很難辨認不同機構的員工。可見政府完全無視服務對象的需要和感受。

問：貴工會長期反對政府借外判化等收縮社會福利，累積了不少經驗。可否與讀者分享這些經驗？

答：對於政府外判服務，本會曾動員員工集會請願，一面向政府表達不滿，一面引發社會人士關注討論。我們並且向公眾揭露機構怎樣「鬥平」投得服務，令公眾看清政府外判服務的動機，同時起著監督機構的作用。

問：面對社福界的巨變，起居照顧員、廚師、工友等前線員工都感到很大的危機感。有些同工覺得大局已定、爭到無用；有些同工覺得即使要爭也要突出服務質素問題，同時要刻意淡化員工保飯碗的色彩。您對這群同工有什麼寶貴建議？

答：基層員工是機構內人數最多的一群，教育他們是一項長期的、艱辛的工作。工會除了通過出版通訊和舉辦活動提升員工的權益意識外，更動員員工參加集體行動，使員工認識到唯有透過集體力量才可爭得權益。保障員工就業權利是工會的天職，即使你不說，但公眾一看到員工組織起來行動，亦知道是為了「保飯碗」，所以不應迴避問題。

起居照顧員及家務助理員協會簡介

於 1991 年成立，現時工作包括關注家務助理服務外判對現有服務單位員工的影響，要求社會福利署公佈長遠服務規劃，確保員工利益。



鄭清發〔右〕

公營服務的外判 ：香港大學的經驗

陳敬慈

1 1999年春，香港大學太古堂的宿生發起了罷食行動。事緣大學接納外判承包商的建議，將該宿舍樓下的飯堂改為酒樓，以豪華的裝修吸引附近居民，從而賺取更高利潤。消息傳出，校園嘩然，抗議四起，終逼使校方放棄計劃。然而，由於服務外判和商業化經營而造成的矛盾和弊病，卻沒有鬆緩。

保安、停車場、飯堂、醫療服務等不同範疇服務的外判，是近幾年來本港大學院校的共同現象。政府所施行的「資源增值」、開支減縮政策，教育系統也不能倖免。1998-2001的三年撥款期，大學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已指令各院校每年減少開支5%，港大飯堂的外判就是以教資會的政策為憑藉。1996年，教資會規定只津助一位「膳食主任」的薪金，要求港大大學膳食服務自負盈虧。在此之前大學轄下的膳食組提供主要服務，且基本上能收回成本，大學只供給數位行政人員的薪金。

學生權益受損害

1998年暑假，正是就業市導最疲弱的時候，大學當局將校內所有飯堂外判。學生的噩夢也於9月重回校園開始：

- 據定期調查，學生對本部各飯堂的滿意度幾乎從未超過3分（5分滿分）；
- 合約所規定價錢便宜的菜款遲遲未見推出，昂貴的卻大加宣傳；
- 衛生和安全條件長期不符合標準；
- 承包商一過繁忙時間就局部關閉飯堂；
- 酒樓式服務範圍以倍數擴大，且設立貴賓房，快餐服務空間和座位均減縮；
- 位置偏僻的飯堂沒有承包商投標，無限期關閉；
- 生意額不高的飯堂縮短開放時間。

承包商的策略是將服務分流，針對不同的市場。透過擴大酒樓服務吸引原本在校外食市用膳的校內員工、夜校學生和週圍居民，以賺取高額的利潤；經濟能力有限的基層學生別無選擇，不管環境多擠逼、食物多差劣，都只能選擇校內快餐。快餐座位的減少，也意味著飯堂作為學生交流、討論的公共空間這一功能的萎縮。

兩年來學生的詬病從未停止，大學被逼考慮提前中止承包商的合約。然而，問題的癥結正在外判政策本身，單靠轉換承包商可能帶來額外的

惡果。校園的咖啡座四年來三易其主，食物的價錢卻每況上昇。經營不夠一個月的利華超級三文治（Super Sandwich）就面對數十同學抗議其價錢的公開信。這是不難想像的，每次招標，校方數以十萬計的廣告和行政費，和承包商為符合其風格往往以百萬計的重新裝修費，都將在短短的兩三年合同期間轉嫁給學生。

剝削工人牟厚利

外判最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企圖在最不能以利計益的地方榨取暴利。學生對學校的情感記憶往往緣自一杯奶茶、一次下午茶的閒談或爭辯。外判後的飯堂，無溫情可言，充斥著暴戾、不義和衝突：

- 人手不足，一名工人同一時間要負責不同工序；工資低廉，據調查清潔工作每天工作10小時，月薪\$6,000（約為大學同類員工的一半）；
- 承包商的轉換率極高，工人就業十分不穩定；
- 部份工人連法定的勞工假期和年假都沒有；
- 工人不能參加大學工會，投訴無門。

由於工作任務的繁重，一旦不能應付，工人就要面對顧客和老闆的雙層壓力。飯堂內學生和工友的衝突屢見不鮮。曾有工人向校內學生會投訴僱主，但學生會已不能好像以前監察膳食組一樣過問承包公司的內部運作。

大學官僚最受益

大學當局對此熟視無睹，因為他們正是剝削的最大得益者。每一飯堂要交30-40萬的擔保金（Deposit），另每月再繳3-4萬元加上營業額2%-2.5%的「維修費」。這一大筆靠剝削工人和犧牲學生利益而竊取的利潤，校方沒有因應要求，用來改善學生服務，也沒有交代其用途。連上述教資會資助的「膳食主任」也不肯聘請，薪金同樣不知所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片財政緊縮聲浪中，唯獨大學的公關費和應酬費以倍數增加。

事實上，行政者已開始意識到外判非萬應靈丹。1999年，大學將差不多全面外判的保安服務重新收回大學管理，就是忍受不住承包公司惡劣的服務質素。不同的是，在十四樓的俱樂部用餐的官僚們並沒有感受到學生的苦況。飯堂的外判也確實帶給他們太多的方便和好處。除了財政的得益外，他們也成功的將學生與官僚之間的長期矛盾轉變為學生與承包商的矛盾。現在，學生對膳食問題的投訴一般指向承包商，甚至底層員工。大學行政者則扮演超然的角色，「中立」的介入事件，絲毫不談大學在學生福利上的責任，以及昂貴的「維修費」的催化作用。

帝國中心的風暴

—華盛頓反世銀和國基會的抗議

■ 施鵬翔

在 4月中，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於美國華盛頓舉行年會，引來逾萬人到來示威。很多人都把這次抗議看作是去年西雅圖抗議世貿的延續，除了因為兩者的組織手法相似外，還因為世銀、國基會和世貿被視為是主宰世界經濟模式的三大跨國組織。

不同的是，華盛頓示威的規模比西雅圖小得多，只吸引了一萬名左右的人來抗議，但警察的鎮壓卻明顯加強了，不單在遊行舉行前查封抗議者的辦公室，會議舉行期間更總共拘捕了一千三百名示威者。

警方的鎮壓升級，除了因為吸收了西雅圖的經驗，不想世銀／國基會的會議被示威阻延，更因為華盛頓不比西雅圖，是美國的軍政心臟，美國政府自然不惜出動強大的警力去限制和打擊示威的規模。

但美國政府的反應愈大，便愈令人質疑「民主國家」的表達自由何在。而且，世銀和國基會常常被批評是美國所控制的工具，去推行有

利美國企業的經濟發展政策。華盛頓就好像是司令台一樣，控制著世銀和國基會的運作。明乎此，便明白為什麼美國政府要鐵腕對付華盛頓的示威者。要在帝國的中心造反，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事實上，針對世銀和國基會的抗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直至現在為止，曾有三十多個國家因為飽受世銀和國基會的發展政策之苦，而發生「暴亂」。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世銀和國基會呢？主要原因是當世銀和國基會向發展中國家借貸的時候，要求借貸國必須推行連串的經濟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 * **開放市場，撤消對外資的管制**，結果是使先進國的工農產品可通行無阻地在負債國大量傾銷，造成大批農民和工人生計盡失；
- * **為了保證負債國準時還債**，世銀和國基會更要求負債國努力降低大眾的生活水平，包括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及公共開支，限制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



〔左圖〕在華盛頓的反世銀及國基會示威中，有示威者以身體阻止國民警衛隊的車輛前進

1997年政權交接後，第一個在會展新翼舉行會議的就是世銀和國基會。當時香港亦有團體到場抗議，更有五名參與者被捕和起訴。香港政府原來想利用此會議突顯香港的經濟模式不變，繁榮依舊，但轉眼間金融風暴席捲亞洲，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被殺個措手不及。

金融風暴發生後，已有人指世銀及國基會的政策，尤其要求負債國撤銷對金融資本流動的限制，是危機暴發的根源之一。最近前世銀主席及首席經濟學家史提力士 (Joseph Stiglitz) 更以過來人的身份，力陳世銀和國基會如何促使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例如後者在90年代初逼使南韓及泰國等地開放金融市場，大量熱錢流入東亞，為後來的金融風暴種下禍因。

香港人感受不到世銀和國基會的影響，是因為香港不是負債地區，而且香港奉行開放市場的原則，符合世銀和國基會的政策。不過，正因為如此，香港也不能倖免於金融風暴的打擊。相對來說，金融市場比較封閉的台灣和中國就逃過一劫。

香港雖然不是負債國，卻是助紂為虐的借貸國。金融風暴發生後，特區政府透過國基會向泰國借出十億美元，協助「拯救」泰國的貨幣危機。這筆借貸當然又附帶苛刻的條件，結果不單無助泰國解決危機，恐怕更有份延續危機。正如史提力士指出，國基會在危機爆發後不單沒有鼓勵東亞政府採取宏觀調控的政策，制止危機的深化，反而以借貸要求有關政府推行進一步的自由化及緊縮政策。

無論是作為受害者或幫兇，香港早已處於世銀／國基會所佈下的經濟格局之中，我們自然不能置於事外。



勞動節介紹

美國華盛頓大規模的反世銀示威剛被無理鎮壓，示威群眾已經意識在 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發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為什麼選擇 5 月 1 日這一天，作為國際勞動節呢？

大約 120 年前，歐美等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工人每天要工作 12 小時以上的工作，工資很低。1886 年 5 月 1 日美國工會聯合會發動全國性示威和罷工，要求立法制訂 8 小時工作制。芝加哥的工人在乾草市場廣場上集會，給統治當局血腥鎮壓，打死打傷了幾十名工人，四名工人領袖更被判處死刑。

美國工人的英勇抗爭，很快傳到歐洲。1890 年法國巴黎舉行「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代表們一致通過每年 5 月 1 日定為國際勞動節，每年這一天都發起各國工人示威遊行，要求訂立 8 小時工作制和其他改善勞工處境的措施。從此之後，五·一國際勞動節便成為全球勞工階級的重要節日。

在今天，當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全面打擊民眾生活和自然生態的時候，勞工階級和所有受被壓迫者的國際團結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更迫切。而制訂 8 小時工作制和其他勞工保護，便是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第一步。

《全球化監察》是一份非牟利刊物，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的工作。我們希望為市民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6 期連郵費）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6 期連空郵費用）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12 期連空郵費用）

從第 ___ 期開始訂閱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本地訂戶：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72142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匯形式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 (Hang Seng Bank) 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訂閱及捐款